

May. 29
2025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39 期）

联合国大会与 全球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张馨丹 蔡皓宇 刘哲希
张尊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专题序言

2025 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联合国大会作为该组织的主要议事、决策和代表机构，为成员国进行多边讨论提供了独特平台。本期《全球治理学科动态》以“联合国大会与全球治理”为主题，考察了联大投票的多个环节及联大各类决议文本的联署情况，分析了不同行为体在联大框架下的行动逻辑与外交策略，展现了联大相关的丰富数据对全球治理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亦有助于深化对联大决策过程及其背后权力结构与互动机制的认识。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倡导者、维护者与践行者，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支持联大依照宪章发挥更积极和重要作用。

本期目录

1. Joshua Fjelstul, Simon Hug, and Christopher Kilby, “Decision-mak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Resolution-related Decis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thcoming.
2. Alexander Baturo and Julia Gray, “Lead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vitalization or Politic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4, 2024.
3. Rafael Mesquita, “What Do I Need to Say to Get Your Signature? Adding Draft Resolution Text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ponsorship Dataset,” *Research & Politics*, forthcoming.
4. Julia C. Morse and Bridget Coggins, “Your Silence Speaks Volumes: Weak States and Strategic Absence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3, 2024.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 1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shua Fjelstul, Simon Hug, and Christopher Kilb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thcoming

“Decision-mak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Resolution-related Decisions”

《联合国大会中的决策制定：表决行为的综合数据库》

现有的联合国大会（UNGA）投票数据库（如 UNDL 和 BSV）因覆盖范围不全和标准不一而存在系统性偏差。本文探讨了这一问题是否会对基于这些数据进行的学术研究（如政策偏好测量、国家间一致性、外交行为分析）造成实质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全面、一致、可复现的数据库，以支持国际组织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作者认为 UNGA 的表决行为不仅反映了成员国的政策立场和偏好，而且对衡量国家间合作、联盟结构和外交一致性具有重要作用。作者依据以下机制说明研究的必要性：

自 1954 年起，联合国允许成员国在会后提出“投票修正”（amended vote），即改变自己在会议上登记的立场。这意味着大量 UNGA 的决议是通过非记录投票或共识（consensus）方式通过的，而这些行为在传统数据库中往往被系统地忽略。在现有的 UNGA 数据库中，研究者通常仅使用点名投票（roll-call vote）来度量国家立场，因为只有这类投票能够明确记录各国的表态。这导致了在 UNGA 的 BSV 数据库中存在“原始投票”与“修正投票”混合使用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差异无法体现。忽视“投票修正”的做法意味着对国家最终意图的误判，



因此作者认为这样的数据结构不统一会影响国家最终制定政策时的稳健性。

一项 UNGA 的决议往往不是一次投票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修正案（amendments）、动议（motions）、段落表决（separate votes）等多个环节，最终才进入整案表决阶段。然而，现有数据库多数仅记录了“最终是否通过”的结果，而忽略了这些前期关键步骤。忽视这些程序性决策的存在，意味着研究者无法还原国家在议题设置与文本塑造时的考量。因此，这种结构性遗漏会掩盖国家在谈判与表决路径中的实质性博弈行为，从而影响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完整理解。

在 UNGA 的表决过程中，是否触发点名投票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图的选择行为。现有数据库多以结果为中心，忽视了“谁”选择在“何时”发起投票请求这一过程性信息。作者发现，苏联/俄罗斯、波兰、叙利亚等国家在历史上频繁作为发起方要求进行点名投票，体现出其在特定议题上的策略运用。换言之，议程设置本身已构成外交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忽视这种议题选择机制的偏差，等同于忽略了外交政策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主导逻辑。

为回应现有 UNGA 数据库的问题，作者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UNGA-DM（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ecision-Making Database），以实现 UNGA 中所有“与决议相关的表决行为”的系统性记录。该数据库覆盖第一届大会至第 77 届大会期间，包括常规会议、特别会议与紧急特别会议中，所有通过点名投票、非记录投票或共识形式所做出的决策。不同于以往数据库仅聚焦于“最终表决”，UNGA-DM 将修正案、动议、段落表决等程序性环节也纳入其中，并首次区分和记录了“原始投票”与“修正投票”，在数据结构上实现了统一。

在数据整理方面，作者首先使用联合国数字图书馆获取所有通过的最终表决信息，随后利用会议记录及《联合国议程索引》（Index to Proceedings）补充未通



过的草案投票与程序性投票信息。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研究团队还对 ICPSR、BSV 数据库中存在的不一致记录进行了人工校验。通过将原研究中使用的 BSV 数据替换为 UNGA-DM 数据，并控制原模型设定不变，作者比较了关键解释变量的变动趋势、显著性与结论稳健性，从而系统性评估数据结构优化对实证推理的影响程度。

为评估该数据库对既有研究结论的影响，作者选取了四篇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进行复现分析。首先，在对 Gartzke (2007) “资本主义和平”理论的复现中，作者发现国家间政策一致性对战争发生概率的影响被削弱，由此推断以往数据对国家立场一致性的高估可能夸大了外交行为中的和平效应。其次，在 Kilby (2011) 关于美国与日本在亚开行中影响力的研究中，原始 BSV 数据支持美国主导说，而 UNGA-DM 下的估计结果显示日本影响力更显著，反映出 BSV 遗漏部分关键投票可能掩盖了非西方大国的制度作用。再次，在 Dreher 等 (2022) 关于安理会“投票换援助”机制的研究中发现美国通过双边与多边援助影响投票行为的证据更加显著，进一步支持了“间接激励”假说。最后，在 Clark 与 Dolan (2021) 对世界银行贷款附加条件的分析中，虽然美国政策偏好与条件强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由于 UNGA-DM 估计的政策距离分布更集中，导致回归结果的置信区间变宽，意味着样本估值的置信程度降低。

总体而言，以上复现实验证明，原有数据库因结构不全、覆盖不一致而可能对理论推论产生误导，而 UNGA-DM 凭借其全面性与一致性，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更为稳健和透明的实证基础。

编译：张馨丹（北京外国语大学）



No. 2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exander Baturo and Julia Gr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4, 2024.

“Lead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vitalization or Politicization?”

《联合国大会中的领导人：振兴还是政治化？》

本文探讨了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中日益增长的出席率及其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基于 1946-2019 年近 10000 名国家代表的数据及文本分析，研究发现领导人的演讲通常偏离大会政策议程，倾向于讨论其个人特殊议题，并采用更简单、更个人化的修辞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领导人参与可能提升联合国大会的关注度，但其言论特点或导致多边合作议程的政治化，可能减弱而非增强联合国大会的活力。

近几十年来，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UNGA）中的出席率显著增加，特别是自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以来，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的常态化参与对多边合作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联合国大会原本被设计为由外交官进行议会式审议的论坛，而非国家元首的舞台。然而自 21 世纪初以来，国家领导人的参与率大幅上升，从 2014 年开始，超过半数的联合国大会发言者是各国政治领导人。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领导人出席对联合国大会功能及其合法性影响的重要问题：领导人的参与是否有助于联合国大会的“振兴”(revitalization)，还是导致了其“政治化”(politicization)？

作为联合国最具代表性和包容性的机构，联合国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振



兴其工作和提高其效能的方式。自 1949 年起，大会便开始讨论如何改进程序和组织，1990 年代通过了三项“振兴”决议，2001 年起每年都会通过振兴决议。2005 年第 60 届会议更是专门成立了振兴特设工作组。但在振兴大会方面的努力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多代表公开抱怨振兴疲劳”。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被视为对大会振兴的积极贡献，也可能被视为对真正多边合作的干扰。

本研究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演讲是否有助于全球议题的讨论，或者反而偏离了合作性辩论的轨道？这一问题对理解国际组织中个体行为者的影响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建立了关于 1946-2019 年间近 10000 名联合国大会国家代表身份的原始数据库，并将其与联合国大会辩论文本相匹配，形成了研究的基础数据集。研究提出两个主要假设：

H1：议程假设：领导人的演讲将更具特殊性（particularistic），较少关注关键全球问题，与核心议程的相似度较低；

H2：沟通质量假设：作为政治人物，领导人更倾向于使用一般性语言，更多使用个人代词，较少使用外交术语。

为检验以上假设，研究采用了四种实证方法：词嵌入分析、领导人演讲与大会主席演讲的相似度分析、与联合国秘书长演讲的相似度分析以及主题分析。研究使用潜在语义缩放（LSS）方法测量演讲中对“全球议程”的关注度，并使用余弦相似度测量不同发言者与大会主席演讲的相似程度。

首先，作者使用潜在语义缩放技术测量领导人演讲中对全球议程的关注度，通过计算选定种子词（“cooperate”，“global”，“agenda”，“united nations”，“organization”，“assembly”）与每篇文本中所有其他术语之间的相似性。这种分析显示，无论来自何种类型国家的领导人对全球议程的关注度低于其他代表。



其次，作者计算了不同类型发言者与大会主席演讲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以测量领导人演讲与联合国政策目标的偏离程度。与大会主席演讲相似度较低表明领导人讲话更具独特性，涵盖的议题与主席演讲中涵盖的议题不同。研究发现，领导人演讲与大会主席演讲的平均余弦相似度为 0.547（标准差为 0.106），而其他类型发言者的相似度为 0.602（0.097），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再次，研究通过结构性主题模型比较了大会主席演讲中最显著的政策主题与领导人演讲中的主题。研究表明大会主席更侧重于联合国及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规范和原则，而领导人则更关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贸易和经济改革、恐怖主义、国际规范原则以及全球合作等不同主题。

最后，作者通过考察其复杂性、外交术语使用和自我中心性，分析了领导人演讲的质量。结果显示，领导人的演讲更“易于”理解，使用的外交术语明显少于非领导人，并且更可能在其联合国大会演讲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表现出更强的自我中心性。

以上发现表明，虽然领导人的存在可能为联合国大会带来更多关注，但他们的言辞往往偏离核心议程，更加简单化和个人化，可能削弱辩论质量。

本研究认为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演讲往往偏离全球政策讨论，更多关注其个人政治议程。虽然领导人的参与可能为联合国大会带来更多的公众关注，但这种关注可能适得其反，将辩论变成“达沃斯的晚夏版本”。当领导人成为焦点时，可能会挤压真正辩论的空间，阻碍谈判进程。领导人的参与和对其特殊议程的关注可能导致联合国大会中出现更多更具离心力的立场。

编译：蔡皓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3



Rafael Mesquita

Research & Politics

Forthcoming

“What Do I Need to Say to Get Your Signature? Adding Draft Resolution Text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ponsorship Dataset”**《何以获得联署？将决议草案文本纳入联合国大会提案数据集》**

联合国大会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决议虽不具强制约束力，但却反映了国际社会的观点和趋势。以往的联合国大会提案数据集主要关注联署决策，即哪些联合国成员国在何时加入哪些草案，却忽略了草案的完整内容。这一局限性使得研究人员难以全面理解联合国大会决策背后的复杂因素。本文旨在对该数据集进行重大更新，通过在既有数据集最终添加 2000 年至 2020 年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决议草案文本，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文章通过三个应用展示了新数据集的价值。第一个应用为“联合国决议草案主题分析”。文章利用更新后的数据集进行基于字典的关键词搜索，以观察主题的分布变化。以民主化议程为例，研究人员用包含“民主”相关和“主权”相关词汇的两个字典，分析 L 文件（指联大尚未表决的草案提案文本）清理文本。数据结果显示，涉及民主和主权术语的文件数量不同，且从纵向来看，民主化热度下降，主权议题后来居上，同时民主含义在联合国大会输出中也发生了变化。综合来看，冷战结束时联合国对这一议题热情高涨，但后来因多种因素态度渐冷。

第二个应用则聚焦于情感分析。文章指出，由于在联合国大会中，不同的主题词汇可能会干扰外交官表达的情感，对联合国文本进行情感分析的结果可能存



在偏误，而借助文章构建的数据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文章构建数据集时会关注文本中的斜体动词，而这一类词语是联合国官方表达情绪的重要方式。文章使用 Lexicoder 情感词典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文件进行分析发现，全文情感得分常为正，段落动词更易出现负值，不同分主题的情感得分差距明显。

第三个应用探究了“文本更新”这一议题。文章指出，更新后的数据集记录了联合国决议草案的编辑次数和参与方的信息。该研究重点关注了至多进行了两次修订且来自第三委员会的草案。该研究比较了 L 文件的版本差异，并识别出相较于旧版本文件，新版本文件删除和添加的词汇。文章认为，这些词汇可以被视为影响提案成功率的因素。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例，文章指出，提案文本的更新对于不同类型国家获得联署的可能性存在影响。

本文对联合国大会提案数据集进行更新，并通过三个例子展示了其在多方面的应用价值。但这一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文章使用的衡量不同议题的字典较为简单，未充分考虑文本变化的复杂性。未来的研究可运用其他方法对数据库进行拓展，例如主题建模、文本分类、知识图谱等。未来研究也可分析“文本编辑情况”对联合国谈判动态及语言选择的影响，进一步拓展联合国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编译：刘哲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No. 4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ulia C. Morse and Bridget Cogg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9, No. 3, 2024.

“Your Silence Speaks Volumes: Weak States and Strategic Absence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沉默胜千言：弱国与联合国大会中的策略性缺席》

在联合国投票中，无论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都会被记录和公开报道。相比之下，缺席是安静的，是一种媒体通常忽略的政治表达形式。本文认为沉默在政治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并重点关注了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策略性缺席。对联合国一些决议的投票观察使作者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错过很多重要的投票？甚至错过多次？如何理解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缺席？

联合国大会中近四分之一的联合国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因此弃权与缺席都可被视为对“基准一致性”的偏离。但这两种投票行为并不是彼此完美的替代品，而是对政治局势的不同应对方式，对结果也有不同的影响。弃权可被视为表示中立的公开信号，削弱了投票的一致性。相比之下，缺席则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们减少了就特定决议进行投票的成员国总数，但几乎不被报道，也因此对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很小。缺席利用制度规则来最小化政治后果，其含糊意图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表达形式。

在联合国大会中，缺席可能存在多种原因，包括未能支付会费而失去投票权、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而没有派遣代表团，或是为了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策略性地回避有争议或政治敏感的决议。文章将这种出于政治原因故意缺席投票或会议的



缺席定义为策略性缺席，并将其操作化为一国在当天参加了其他联合国大会决议并投票的情况下缺席某个决议的投票。虽然文中数据集里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在某个时间点采取策略性缺席的做法，但作者认为“弱国”更常使用具有安静性质的策略性缺席。相较于物质或意识形态资源相对较多的国家，弱国面临能力限制，通常缺乏各类资源来跟上整个联合国大会议程，同时必须依赖其他国家在某些问题上的政策指导。因此弱国更常利用缺席作为一种制度权力，以保护自己免受地缘政治压力和竞争性原则问题的困扰。

与美国的地理政治联系和竞争原则情况有助于解释联合国大会中的策略性缺席。冷战结束后，美国多次寻求国际组织的政治掩护，其国内政策也为各国跳过重要投票创造了更大激励。此外，美国很可能是最活跃的游说力量。非美国盟友可能将缺席作为一种安抚美国和避免投票的政治成本的方式。因此，基于政治掩护和竞争性原则的影响，作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如果一项决议对美国很重要，那么未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更有可能策略性缺席；

H2a：当美国投“赞成票”而俄罗斯投“反对票”时，国家更有可能从投票中策略性缺席；

H2b：当美国投“反对票”而俄罗斯投“赞成票”时，国家在投票中策略性缺席的可能性较低。

使用 1990 年至 2021 年联合国大会的记名投票数据（BSV）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虽然美国盟友不太可能缺席重要的投票，但与美国不结盟的国家确实更有可能在这些投票中缺席；当美国投票反对俄罗斯时，策略性缺席的可能性更大，而当美国投票反对时，策略性缺席的可能性较小。这种竞争性原则的影响，在物质上最弱的国家中表现得最强。作者通过收窄策略性缺席的定义范围，以及



利用美中关系替代美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此外，为进一步区分弃权与策略性缺席，作者将因变量策略性缺席替换为弃权重新进行了计量。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表明相关影响因素与弃权投票相关，策略性缺席也并非仅仅是对弃权的替代。

相关研究通常认为缺席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足轻重的，反映了能力不足或某些特殊因素。本文则指出一些缺席具有策略性质，可能像弃权一样，缺席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同样具有一定的信息量。策略性缺席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为弱国提供了影响国际政治的独特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该研究发现了一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管理地缘政治压力的关键方式。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韩 冰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李 冲 韩永辉
宋 锦 田 旭 沈 陈 彭 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张尊月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邢珣璠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